

论 1990 年代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的诗学特征

高 伟 孙 超

内容摘要：乌利茨卡娅是新俄罗斯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鲜明代表，她的创作以对个体的高度同情和细微的心理描写著称。本文以作家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了其创作中的诗学特征。冷峻的战后岁月和闭塞的空间构成了乌利茨卡娅小说叙事的特有时空背景；梦境描写既是作家谋篇布局的手段，又是表达主题及创作主旨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人称叙事和准直接引语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要话语手段。

关键词：乌利茨卡娅；诗学特征；时空；梦境描写

作者简介：高伟，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教育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孙超，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项目批号：13&ZD126】、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后现代小说互文性研究”【项目批号：13B042】和黑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俄国小说的互文本研究”【项目批号：JC2012W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Ulitskaya's Novel Creations in the 1990s

Abstract: L. E. Ulitskaya is a distinct representative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Russian Literature. Her creations are well known for strong sympathy for the individuals and subtl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this paper, taking Ulitskaya's novels created in 1990s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her creation. The stern post-war years and closed space constitute a unique space-time background. Description of dreams is not only the means to design and arrange the writings, but also the organic part of expressing the theme and creative aims. The third person narrative and free indirect speech constitute the main means of narrative fiction.

Key words: L. E. Ulitskaya; poetic characteristics; space-time; descriptions of dreams

Authors: Gao Wei is editor at Heilongjiang Edu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2004.gaowei@163.com Sun Chao,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of Russian Institute a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sunch725@sina.com

乌利茨卡娅是新俄罗斯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鲜明代表。虽然成名于国外，但在较短的时间里作家就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她的作品被译成近三十余种文字，受到全世界各国读者

的喜爱。乌利茨卡娅获得的众多文学奖项,是对她艺术创作水平的最好证明:1996年获法国“美第契”奖,1997年获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1999年获意大利“朱赛佩·阿采尔比”奖,2001年获俄语布克奖,2004年在莫斯科第17届国际图书展销会上因其创作“在非商业文学领域中享有的创纪录的畅销”而被评为年度作家,2005年初,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骑士勋章,2007年又成为俄罗斯文学奖“大书奖”的获得者。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界,乌利茨卡娅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无疑,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其在作品中描绘的独特艺术世界和诗学特征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乌利茨卡娅小说的时空建构

乌利茨卡娅特别善于选取那种十分严峻、甚至是残酷的历史时刻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冷峻的20世纪五十年代成了乌利茨卡娅笔下许多小说叙事的大语背景。短篇小说“大麦粥”(Перловый суп, 1991)及《穷亲戚》(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1994)和《49年的童年》(Детство сорок девять, 2003)两部集子里许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这个时代。20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可以让作家更加深入地刻画那个特定时代自身的矛盾本质及其内在的冲突实质。在“那一年的3月2日……”(Второго марта того же года, 1991)和“非人工的礼物”中(Дар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 1994),小说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时代尾声的1953年。这一点甚至在第一部小说的标题中已有所预示。作家运用省略暗示法传达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独特氛围:人们对既成事实的一切似乎还心存恐惧。

乌利茨卡娅多数小说(短篇小说尤为典型)中的时间,并非直接表达出来,而要精心阅读透过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上下文推测出来。作家经常会使用艺术细节来传达特定时代的标志(如肖像细节)。“幸福的人”(Счастливые, 1991)中主人公玛季阿斯“留着斯大林式浓密的短须”(191),^①从人物外表不难看出时代留给他的痕迹;“弃婴”中维克多莉娅杜撰的女邻居别肯利哈的外貌,几乎成了那个可怕时代的典型:“个头甚至比男人还高,剃着男人一样的平头,面容苍白,身上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都知道她是一个酒鬼,尽管没有人见过她喝醉的样子”(339);类似的人物类型还有很多,如“那一年的3月2日……”中的鲍德里克、“可怜的幸福儿科雷万诺娃”(Бедная счастливая Колыванова, 1994)中的“蜘蛛侠”、“布罗妮卡”(Бронька, 1989)和“布哈拉之女”(Дочь Бухары, 1993)中小院里的半大小子等。

乌利茨卡娅笔下的日常生活,既表明了主人公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标志。作家通过一些生活中的物象细节同样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性。对希姆卡来说,邻居家“桌子上铺着的白色桌布和蓝色茶碗”(200),就是富足、有保障生活的象征(“布罗妮卡”)。自传女主人公莉丽娅·日什蒙尔斯卡娅家里摆放的各种物件,如罩上棉套的老式转椅、当时普通人家里少见的电视机、铜制铁床、油画及厚实的窗帷等,给人一种沉稳、充盈且舒适的氛围,这与公共住宅里的普遍贫穷与窘迫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一年的3月2日……”)。描绘民众生活的宣传画(“那一年的3月2日……”、“布哈拉之女”)和摆在教室后面的三角标语(“那一年的3月2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既反映出官方所倡导的理想社会模式,又预示着发生事件的真正实质。这里有紧张的国际主义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陈规陋习:鞑靼人与鞑靼人交朋友,中等生同中等生是好朋友,医生的孩子们结交的是那些父母也同样是医生的同学。犹太医生的孩子们更是

如此”（356-57）；这里也有被意识形态迷醉的广大民众：“面对摆在利丽娅班级墙角里的悠远的五彩斑斓的灰色三角标语，画上面，在已然褪色的远景站着一小撮伟大民众的杰出代表，宣布到，他死了”（367）。摆放在博物馆中的送给斯大林的礼物，连同被多次提到的物象，不仅是特定时代的标志，传达了当时唯官方至上的特殊气氛，也表达了一种戏剧性和游戏性，抒发了作家对当时发生事件的独特态度（“非人工的礼物”）。此外，“大麦粥”里的大麦粥形象是联结三个独立小故事的核心母题。“为什么儿时的生活三次清楚地留下了大麦粥这个印记？它确实呈珍珠灰色，搅拌时会变成与胡萝卜类似的粉红色，在锅里煮时会有几块糖块拌在里面”（Улицкая, *Сквозная линия* 246）。这个细节被作家用来概括和描述20世纪四十年代复杂的苏联生活。

一些物象细节（比如“茶碗”、“桌布”、“手提包”）贯穿乌利茨卡娅的多部作品，成为作家笔下特定时代典型的中心细节。乌利茨卡娅笔下的物象世界与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世界息息相关，这在小说“‘小手包’盖涅列”（Генеле-сумочница, 1993）里表现得比较集中。在作家的很多小说里，物象甚至成为小说标题，如“大麦粥”、“白菜奇事”（Капустное чудо, 2003）、“蜡制尿壶”（Восковая уточка, 2003）、“小木丁”（Гвозди, 2003）等。

作品中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可以直接表露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时代背景。“幸福的人”中的玛季阿斯是一个“手艺丝毫不比巴黎同行逊色的华沙裁缝”（191），这句看似无意中的表述揭示了主人公的生活历程：年轻时先是在巴黎做活，又到华沙工作过，二战后来到俄国继续老本行；“古利娅”（Гуля, 1994）的同名女主人公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受丈夫的连累，而另外一次，她自己解释说，是因为她的教育程度过高”（273），不难从中体会到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弃婴”（Подкидыш, 1994）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莫斯科小庭院中，早晨在小院的泔水沟旁发现了一具新生婴儿的尸体，警察向左邻右舍索取证词，得到的几个线索却显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这里面“既有私欲，还有蛊惑力，也有想告密的热情”（339）。正是特定的时代造就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疏远。乌利茨卡娅认为，每一个时代既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也有自己的时代品味、时代气息，甚至有专属某个时代的音乐。中篇小说《索尼奇卡》（Сонечка, 1992）中写道：“亚霞的塔夫绸连衣裙发出响亮的刷刷声，金黄色的浓密的头发像是用整块透明的松脂浇铸成的，齐齐地落在肩上，和那年走红的影片《妖女》里的女主角玛丽娜·弗拉吉一模一样”（乌利茨卡娅 38）。虽然作家并没有明确指明事件的具体年代，但不难得知，影片《妖女》在苏联广为流行是1959年第一届莫斯科电影节首映后的事情。

乌利茨卡娅正是通过上述种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战后那个特定时代人的群像。由于乌氏小说叙事的核心几乎都是人的个性命运，所以作品中的时间对表达文本的中心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时间起到了让我们熟悉的功能。它一方面强调了社会进程的荒谬和悲剧意味，另一方面，也由此衬托了的人的生活的恒定价值和先天的坚定品性。

乌利茨卡娅笔下的很多小说都发生在一个闭塞的空间中，主人公的生活空间往往十分有限，他们很少能够摆脱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世界。比较典型的空间是莫斯科的简陋小院、莫斯科近郊的破败板楼或者是几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的公共住房。在作家的笔下，小院、公共住房得到了客观、详实的展示，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自然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这里是“泥土的庭院，杨树间连着的绳子随处可见，上面晒着刚刚洗过的衣裤，也能见到用竹条做成的顶端是金黄色装饰球的华丽栅栏”（208）。这段文字里虽没有评价色彩的词汇，但却充满了代表时代特征的词汇：泥土的庭院、古老的杨树、长有竹子并

饰有金黄色球体的华丽的栅栏。根据这些具体、详实的细节不难断定故事情节所发生的自然时间及历史时间。

难闻的气味、肮脏的环境、冰冷冻人或者闷热难耐的住室,以及令人刺眼的黄色,再加上体液和腐烂菜叶混在一起的恶心味道构成了外在空间的典型特征。“房子里有一个大炉子,正中间挂着一些绳子,上面低垂着浅灰色的衣裤,使人不能即刻看清楚屋子里的人和物”(365)。战后的萧条、停滞甚至从作者对主人公生活空间的称谓都可以感觉到。在“布罗妮卡”、“幸福的人”、“天花”(Ветряная оспа, 1994)和“可怜的幸福儿科雷万诺娃”中,主人公栖居在自己的“猫儿村”。小说“非人工的礼物”里少先队员们眼中的“女英雄”住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莫斯科一个治安情况最为混乱的“玛丽茵密林区”。与此相应,这块地区“到处都是煤棚子、鸽子窝和木板房,随意扯建的粗绳子上堆放着随风摇摆的破衣烂裤”(305)。这些特定的居住场所无疑对主人公们的心理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主人公们之间的打斗、争端以及谩骂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样艰苦的生存空间使得人与人之间原本的隔阂与矛盾更加激化,使得这种社会日常冲突充满了内在的悲剧,显得异常荒诞,也从另一个方面突出强调了那些能够经受住生活磨砺的主人公们的独特性格和迷人气质,表现了他们敢于向生存环境挑战的十足勇气。

乌利茨卡娅小说的梦境描写

乌利茨卡娅的创作往往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在刻画主人公性格方面,作家擅长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梦境描写就是乌氏常见的一种手段。作家曾承认说,“梦境中的世界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世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从那里获得很多启示”(Улицкая, “Принимаю всё, что даётся” 227)。纵观乌利茨卡娅的整个创作体系,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巨著,对于梦的描写都非常普遍。

从表现形式上看,乌利茨卡娅小说中的梦境描写多比较简短、精炼,往往只有三言两语。绝大多数作品是直接点明梦境,有些作品则像描绘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场景那样去写梦,读者需要联系上下文,留意前言后语,方能领悟到作者那隐含字里行间的梦境。这种梦境与现实互为“渗透”,相互“交融”的场景对于那些书写梦想与现实冲突的小说特别明显,如“布罗妮卡”、“可怜的幸福儿卡雷万诺娃”、“苏一黎世”(Цю-юрихь)等。还有一些梦境是在主人公潜意识层面出现的幻觉,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严重的刺激或是精神处于一种异常兴奋的状态下表现出来的,这在那些书写十二、三岁女孩子们所经历的“成年礼”小说中特别明显,如“弃婴”、“那一年的3月2日……”、“天花”等。

总体而言,梦是乌利茨卡娅创作风格中的一个鲜明艺术特征,在文本中起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它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往往能够造成深切细致、真实动人的艺术效果。例如,“穷亲戚们”中的梦境描写。这部小说篇幅很短,它主要讲述了玛季阿斯和贝尔塔在老年得子后又突然失去爱子的故事。与孩子共同生活的八年时光为主人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使他们的生活显得充实而又有意义。所以,回忆过去、回忆先前的幸福生活几乎成为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全部。这一点甚至表现在他们的梦中,“梦中他们见到的景象是每个星期日午饭后的场景,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过的最幸福的那八年时光”(189);对于贝尔塔而言,“在梦中,她就像走入邻居家的房间一样轻松地回到了过去,并在其中轻快地游走,幸福地与自己的儿子呼吸着一样的空气”(191)。这里虽没有对梦境的具体描绘,但它却表达了主人公对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那些难忘的美好情景的向往,对能够获取哪

怕是很微小幸福感的深深感激之情。这样的梦在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 2000）中有大量的描写。它在小说中首次出现是在第一部第十三节“叶莲娜的第一本日记”中，即库科茨基同妻子叶莲娜发生激烈的争论之后。此处的梦境描写既表明了叶莲娜对丈夫力主堕胎合理化的主张深深失望之情，也标志着夫妻间十年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彻底结束，更是叶莲娜抛却尘世生活、执迷于回忆和幻觉的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

其次，梦境是现实人生的真切反映。乌利茨卡娅是一位观察力十分敏锐的作家，她笔下的梦境描写往往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作家希望借此来述说人情世事，以“虚”写“实”，却是为了呈现“实”的本质。这样的小说在乌氏笔下有很多。“古利娅”中的同名女主人公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遭流放、蹲监狱、不幸的婚姻生活、孤独的晚年等，但古利娅对待生活却始终乐观、积极，把每天都当作节日一样度过。有关主人公的过去生活作家很少提及，但却通过梦境描写呈现出来：“但这一次临近早晨的时候却做了一个梦，但是它并不是立刻就出现的，却破坏了古利娅如同过节一样的快乐心情。梦没有头绪。只是觉得受到了别人的摆布，还有对另外一种封闭空间的感受。非常粗俗，异常粗俗。快走开，快走开，真不想继续回忆！桌子上摆放着绒布……乌杰科夫大尉令人嫌恶的骂人话不时传到耳边……滚你……滚你……奴才……下流坯……救世主。快滚开！我不想！”（271）“天花”主要描写了六个中学生在同学阿廖娜家聚会的情景，除了阿廖娜之外，关于其他人物的家庭背景、生存状态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作家只是在主人公们的梦境描写中简单提及，“在那天晚上，普里希金娜也生病了。把她折腾得够呛，被子拧成了一团……她喝了点水，又一次陷入到可怕的梦境中：在她的面前躬身站着一个又高又壮的老头，长得十分可拍，留着尖尖的黑胡须，一个劲地向她的身上吹热气，他就是那个妈妈怕得要死的税务检察官，她的妈妈没有工作，只靠在家里给人缝缝补补赚点钱，多少年来都是无证经营”（392）。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对于主人公而言，这次聚会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它是偶然的、意外的，而由现实生活得到的恐惧却像幽灵一样永远缠绕在身，使其终生难以忘怀；莉丽娅·日什蒙尔斯卡娅同样感受到了类似的痛苦，只不过在她那里，现实的悲痛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她梦到了不想见到的亲身父母来接她（392-93）。在“可怜的幸运儿卡雷万诺娃”中，主人公把自己的班主任理想化了，文本的空间几乎都是对其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结尾处乌利茨卡娅通过梦境描写向我们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卡雷万诺娃与叶夫根尼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现实关系：“她有一次梦见了叶夫根尼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却令人感到不快：好像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走到了她的跟前，就开始用涂得花花绿绿的手指背敲她的脑袋”（412）。梦中的叶夫根尼娅与虚幻中的形象完全相反，这说明主人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潜意识幻想之中。

再次，梦境描写有时起到“统率”全篇结构的作用。它是情节的发端，又是情节发展的动力和转机，还是情节的某种“归宿”。“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 1998）、“别人的孩子”即是以梦境描写开启小说叙事，其目的不是为了把读者带入奇幻的天地或神秘的世界，而是作为再现真实人生或抒发情感的楔子，以虚境带来实境，在引人好奇联想或情感共鸣时，进入主要故事情节。《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Медия и её дети, 1996）及短篇小说“二号人物”（Второе лицо, 2002）中的梦则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美狄亚在丈夫萨穆埃尔去世周年之际梦见他，“他手里拿着一张斯大林像，不知怎么搞的，人像两腿朝上。他拿起锤子，用它敲打玻璃边，然后整整齐齐地取出人像。但是就在他摆弄玻璃时，斯大林消失不见了，在他先前的位置上出现了亚历山德拉年轻时的大照片”（乌利茨卡娅

212)。梦中出现的景象引起了美狄亚的疑虑,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妹妹亚历山德拉写给他的一封信,不仅多年的婚外恋情曝了光,而且主人公也顺便发现,外甥女尼卡是萨穆埃尔与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样,梦境描写打破了先前的情节发展,导向了新的人物关系,成为小说第二部的结构重心,将后面的叙事串联了起来。“二号人物”中的主人公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一生喜好收藏古董,积累了大量价值连城的宝贵文物。80多岁的他没有子女,如何分配财产成了主人公的一块心病,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梦提示了他。“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好像是出于什么票的事情他同已故的妻子吵了起来。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不是他想走,而她表示反对,就是相反,她要即刻上路,而他哪儿也不想去。后来跑来了一群狗,数量特别多而且大小不一,于是,一切人和物都消失不见了,包括艾玛”(Улицкая, *Сквозная линия* 104)。这个梦似乎在告诉叶夫根尼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决定,于是他把所有的继承人都请来单独谈话,以便下最后的决心。情节的发展证明了梦中的情景。最后,他决定把财产全部留给侄子兽医亚历山大,因为他为人善良忠厚、有爱心,平日里最感兴趣的就是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最后,借助梦境可以深化作品的主题,更便于艺术想象力的升腾飞跃,从而打破“时空”界限,从更深更广的意义上揭示作品的创作主旨。短篇小说“上帝的选民”(Народ избранный, 1989)写的是弱智女孩济娜在母亲死后到教堂前乞讨的经历,探讨了弱势群体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该如何面对的问题。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描写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乌利茨卡娅的创新之处在于她对待这些人物的独特观点。作家的立脚点不在于展现主人公的困苦生活,也不是其贫弱的内心世界,而是再现这些小人物对待艰辛生活的态度。作家通过卡佳之口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不幸,而那些遭遇不幸的人的使命就是要勇敢地面对生活,无悔地背负自身沉重的十字架,善于在悲苦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还要因为自己被上帝选中作为对别人的启示而感谢生活,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在小说的结尾,济娜的梦说明愚笨的她终于领悟到了卡佳话语中的思想,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周围到处都是细小的淡蓝色及暗色的鲜花”,她还梦到了唯一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而且“向她微笑地挥着手,又非常年轻”(292)。《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美狄亚的第一个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在父母十周年祭日之际,美狄亚为双亲扫墓,当她坐在一棵橄榄树下时,梦见父母和夭折的妹妹,“他们三人对美狄亚的态度非常和蔼,却没有开口说话。等到他们消失之后,美狄亚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打盹,至少没有从梦中苏醒的感觉,空中却飘逸着一股美妙的古色古香的松香,浸入肺腑,使她激动不已,意识到刚才他们三人轻飘飘地郑重下世,特别是留下这股香气,意思是感谢她把弟弟妹妹们养大成人,同时又好像解除了她多年来自愿承担的义务”(乌利茨卡娅 89)。通过这个梦乌利茨卡娅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自我牺牲主题,把自己的高尚心灵发挥到了极致,将全部心血都用在了照顾弟弟、妹妹的下一代子女上,她成了连结众多家族后代精神世界的中心纽带。而在短篇小说“野兽”(Зверь, 1998)以及《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第二部中,现实生活无法实现的精神追求(主要是亲人之间的和谐与关爱关系)却在主人公们的梦中实现了。这样,梦境描写不仅拓展了小说的空间,而且升华了作品的主题,即现实生活中个性之间的永恒矛盾关系,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

总之,乌利茨卡娅笔下的梦境描写是其塑造人物性格和体现小说创作主题的一手“绝招”。她作品空间中所描绘的“梦的情景”,给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梦者心扉的“金钥匙”,这些梦既是结构全书的手段,又是表达小说主题以及创作主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让读者得

以窥见书中人物的心态、情感、爱憎、性格、悲痛等品性。

乌利茨卡娅小说的叙事话语

在1980—1990年代文化转型期的俄罗斯小说创作中，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反映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再现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和疏离，成为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泰娅、叶·波波夫、皮耶楚赫等作家的叙事重心。这种叙事角度的转换导致了叙事手段和方式的变化。客观冷静的叙事成为作家偏爱的叙事策略，作者从全知全能的叙事中隐退，把叙述职能大多赋予了作品中的人物或主人公。作家们越来越多地直接让事实说话，无意于主观的价值判断，“越来越注意隐去‘自我’，以超然而又冷静的目光审视现实和历史，力求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②充斥在这些作家文本中的情感基调多以反讽、怀疑和揶揄为主。

1990年代才专事文学创作的乌利茨卡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认知和美学原则。她对现实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时代（我指的并非单单是苏联和后苏联社会，也包括西方社会），人性失落的过程异常迅速……当作家镇定地宣称，他的任务就是‘打破各种禁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那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以摧毁现有生活为宗旨的人”（Улицкая, “Плохой читатель” 34-35）。不难发现，作家对待时代的态度不是否定的，而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这种处世态度决定了她创作的题材和塑造的人物类型。作家关注的多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题材，如家庭问题（《索尼奇卡》、《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教育问题（《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和个性成长问题（短篇小说集《女孩们》）等。乌利茨卡娅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很普通、寻常，都是些或多或少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灰色的人”：病人、老人、残疾人、疯子、孩童等，但作家感兴趣的是这些边缘人物身上蕴含的人性品质。她关注的是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世界，所表现的是他们如何克服各种痛苦和不幸，从而变成一个配得上生活的人、幸福的人，并具有内在自由和精神道德的个体。她笔下的人物会生活，会爱别人，也会恨别人，会保护自己免遭不测。正像她自己所说，“尽管俄国当今生活非常艰难、复杂，他们还是获得了真正人的性格”。^③一些人几乎被作者塑造成了道德的忠诚卫士。有些主人公甚至具备了圣智的光辉，成为善良、睿智和创造力的象征，如索尼奇卡、布哈拉、美狄亚、阿利克（“喜葬”[Весёлые похороны, 1998]）等。

乌利茨卡娅1990年代小说的叙事方式也明显有别于很多同时代作家。如果说后现代作家们是冷静的记录者，那么乌利茨卡娅则是一个乐观的观察者。作家更偏爱全知全能式的第三人称叙事手段。叙事者在组织文本、描绘客观世界时显得从容、自信，在刻画人物、描述事件时会流露自己的观点，在表达作者观点方面，叙事者同作者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距离，作者的道德观和美学观密不可分。从叙事者语言来看，小说叙事者是一个来自日常生活，善于观察又非常熟悉主人公生活状态的讲故事者。叙事者对笔下的人物富于同情心，有时甚至对主人公表达由衷的赞赏，对生活以及身边一切事物怀有愉悦和欣赏。叙事者对所有的人物都一视同仁，没有明显的好恶区别。在叙事者兼作者看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获得幸福、关爱的权利。叙事者并不是简单地描写普通人的行为，作者好像以自己的善意和关怀护卫着笔下的这些宠儿，使他们免遭不测，不受外面险恶世界（无论是来自别人，还是来自当局和国家）的干扰。

在乌利茨卡娅1990年代的小说中，作者对待主人公和所述事件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准

直接引语表现出来的。准直接引语的表达优势在于将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语言融合在一起,读者不仅可以听到作者的声音,还可以感觉到人物的声音,呈现出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水乳交融、似分似合的审美形态。使用准直接引语,能拉近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揭示人物的所思所想,更重要的是,还再现了作者的创作意识和态度。构成准直接引语的语法单位既可以是单词和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和完整的句子。在乌利茨卡娅 1990 年代的小说中,更常看到的是以句子形式出现的准直接引语。该类型常常借助语气词、感叹词等情态词,或直接使用感叹句、疑问句及无人称句等,借以表现人物的主体意识。

“在她走回家的 10 分钟内,她意识到自己 17 年来的美满婚姻已经结束,她一无所有了,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不属于她(他何时属于过什么人?);塔妮娅完全是另一种人,不知是像父亲,还是像祖父,但绝不是她那种怯生生的秉性,也不属于她;这栋房子,她在夜间能听到它叹息、呻吟,就像老人对自己渐渐成为异物的身体产生的感受一样,可是这栋房子也不属于她了……”(乌利茨卡娅 48-49)这段话出自《索尼奇卡》。它讲述了同名主人公普通而又甘于奉献、面对丈夫晚年的背叛亦能淡然相对的一生。收到小区要拆除、搬迁的通知后,索尼奇卡跑到丈夫的画室找罗伯特,意外地发现了丈夫与亚霞之间的婚外情。这使索尼奇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要知道在生活中她将自己的全部心智都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但丈夫对自己不再忠心,女儿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与她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在作者的叙述中,句子“他何时属于过什么人”(а когда, кому он принадлежал?)值得注意。作者通过句法手段(即括号)使其明显有别于整段语篇,又用疑问句的方式巧妙展现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内心痛楚的感受。但索尼奇卡与众不同之处恰在于她有一颗宽广的胸怀,她那在经典文学滋养下孕育的灵魂甚至能够宽待丈夫的婚外恋情。她完全是从丈夫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年轻、美丽、温柔、秀气,又和他一样才华出众,这样不同凡响的女人陪伴在他的身边,是多么合乎情理呀。他已步入老年,能遇上这样的奇迹,使他再次转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重新搞起艺术创作,这真是生活的英明安排”(乌利茨卡娅 49)。在这里,准直接引语过渡为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这清楚地表明了索尼奇卡个性独特之处,即丈夫背叛的消息并没有影响到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即始终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对待生活,抱着一种“喜悦并陶醉其中的”^④态度来感受生活。

“正如安娜·马尔科夫娜后来所讲,卫国战争前的一次迁居潮把西姆卡吹到了莫斯科小院。她身体瘦削,两条细长的腿上紧紧地裹着丝袜,穿着一双男人的皮鞋,马车夫把她卸下来后,大声地责骂了一番就走了。西姆卡转动着自己那风车般的双手毫不退让地回骂了几句,就孤零零地和自己的家什留在了院子里,包括一个大斑点羽绒褥,两个枕头和小布罗妮卡,她把其中小一点儿的套着橙色套的枕头紧贴在胸前,可怜的样子让人不禁想起瘦弱的小猪崽儿”(199)。这是小说“布洛妮卡”开篇第一句话。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开始,先以叙述者的视角描述了主人公初来乍到莫斯科的情景。但文中两处带有谐谑口吻的比喻“风车般”、“瘦弱的小猪崽儿”、使用的俗语词“回骂”(отбрёхиваться)及错误的词组搭配“斑点羽绒被”(пятнастая перина)表明叙述者是一个熟悉主人公生活、与其有类似经历的人。这段话不仅给出了对主人公的外在评价,且通过再现主人公的言语,让读者了解了叙述者及主人公的居住环境。有时,叙述者为了拉近与主人公的距离,还会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如:“在她那双灵巧的手里,一只小鸡很快就变成了好多种丰盛的食品,如由无酵饼做的丸子汤、肉馅鸡脖、鸡肉丸子、鸡肝酱,甚至还有肉冻食品。她怎么这么有才?做出这许多……在做鸡的同时,一条加肉馅的鱼也做好了,还包括挂浆花生”(226)。

在乌利茨卡娅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作家善于选取残酷的历史时刻和闭塞的空间来作为小说的时空背景。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不仅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也突出强调了那些能够经受住生活磨砺的主人公们的独特性格和迷人气质，表现了他们敢于向生存环境挑战的十足勇气。在塑造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方面，乌利茨卡娅经常采用梦境描写。这些梦既是结构全书的手段，又是表达小说主题以及创作主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让读者得以窥见书中人物的心态、情感、爱憎、性格、悲痛等品性。作家经常使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展开叙事，作家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一个来自日常生活，善于观察又非常熟悉主人公生活状态的讲故事者。叙述者对笔下的人物富于同情心，有时甚至可以感到叙述者对主人公的由衷赞赏。

不言而喻，乌利茨卡娅在其20世纪九十年代小说文本形式层面表现出来的诗学建构特征是其美学主张和创作原则的集中体现。在20—21世纪之交的当代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对世界图景的整体性、人的个性以及存在的否认几乎成为文学主流之一。乌利茨卡娅的小说则迥异于这种创作潮流，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待主人公的深切关爱之情，对“个体生活”的高度关注和褒奖肯定，以及与文学前辈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烈耶夫等）创作的密切联系，使她在众多当代俄罗斯作家中独树一帜。

注解【Notes】

- ①参见Л. Е. Улицкая, *Сонечка: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М.: Изд-во Эксмо, 2002)。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②参见张建华：“论俄罗斯小说转型期的美学特征”，《当代外国文学》4（1995）：82。
- ③ См.: Л. Е. Ули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жизни...”,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 4149, 20 ноя. 1996.
- ④ См.: О. Чистякова, “Концепт «жизнь» в повести «Сонечка»”, *Русская и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Казань: Казан. гос. ун-т, 2004) 28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Улицкая, Л. Е. “Плохой читатель.”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 (1996): 33-36.
 [Ulitskaya, L.E. “The Bad Readers.” *Problems of Literature* 1 (1996): 33-36.]
 ---. “Принимаю всё, что даётся.”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 (2000): 215-237.
 [---. “I Receive All, What Allow Oneself.” *Problems of Literature* 1 (2000): 215-37.]
 乌利茨卡娅：《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李英男 尹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
 [---. *Medea and Her Children*. Trans. Li Yingnan and Yin Cheng. Beijing: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1999.]
 Улицкая, Л. Е. *Сквозная линия. Повесть. Рассказы*. М.: Изд-во Эксмо, 2002.
 [---. *Women's Lies: Story. Short Novels*. Moscow: Eksmo, 2002.]

责任编辑：王树福